

·中国学术百年·

国际共运史学 百年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北京市国际共运史学会 组织编写
主 编 李景治

 北京出版社

·中国学术百年·

国际共运史学 百年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北京市国际共运史学会 组织编写

主 编 李景治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共运史学百年/李景治主编. —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9

(中国学术百年丛书)

ISBN 7-200-03985-3

I. 国… II. 李… III.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史 IV. D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1656 号

·中国学术百年·

国际共运史学百年

GUOJIGONGYUNSHIXUE BAINIAN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北京市国际共运史学会

组织编写

主编 李景治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朝阳展望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125 印张 218 000 字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0-03985-3

D.346 定价:16.00 元

本书编委会名单

顾问：高 放 张汉清 曹长盛
李宗禹 张中云 张伟垣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明进 孔寒冰 向文华
李景治 张光明 胡振良
常欣欣 蒲国良

本书作者名单

（按章次排序）

李景治 王明进 蒲国良
向文华 邓 剑 孔寒冰
孙 瑞 李 全 高静宇
胡振良 张光明 常欣欣
官施仁

致读者

历史巨人的步伐即将迈向 21 世纪。过去的一百年里，中国人民历经沧桑，在奋起斗争中实现了伟大的历史变革。曾被称为“沉睡的雄狮”的中国已经觉醒，并以其惊世的雄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间，中国的学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辛勤耕耘，为祖国的昌盛和科学的繁荣竭智尽忠。《中国学术百年》这套书，正是试图对这一历史进程留下记录。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组织十余个学会的近百位专家学者，经过一年半的努力，终于可以在本世纪末将这套书奉献给读者了。一年多来，我们召开了几十次会议反复探讨，作者们不辞劳苦专心撰文，都是希望展现百年来各学科的发展脉络，反思其曲折经历，总结其宝贵经验，为学界同仁提供有益启示。果能如此，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谨以此套书献给即将到来的新世纪！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1999 年 10 月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我国国际共运史研究的启蒙时期	
(1921 年以前)	(18)
第一节 社会主义知识与理论传入中国	(19)
第二节 十月革命的影响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30)
第三节 五四时期文化理论界关于社会主义与中国道路的讨论	(42)
第四节 早期共产主义者对国际共运史的学习与研究	(50)
第二章 我国对国际共运史的早期研究	
(1921 ~ 1949 年)	(53)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问题的讨论	(53)
第二节 共产国际研究	(61)
第三节 巴黎公社研究	(65)
第三章 国际共运史研究在我国的初步发展	
(1949 ~ 1956 年)	(69)
第一节 关于学习苏联问题的讨论	(69)
第二节 对中苏同盟的评析	(73)
第三节 探讨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	(76)

第四节	歌颂斯大林	(80)
第四章	我国国际共运史研究的进展与偏差	
	(1956 ~ 1966 年)	(84)
第一节	思考苏联模式	(84)
第二节	评价斯大林	(88)
第三节	阐述和平共处原则	(92)
第四节	维护社会主义阵营	(95)
第五节	探讨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	(98)
第六节	批判南斯拉夫	(107)
第七节	支持民族解放运动	(113)
第八节	指斥和平过渡理论	(118)
第五章	我国国际共运史研究的停滞与失范	
	(1966 ~ 1978 年)	(122)
第一节	对修正主义的批判	(122)
第二节	对马克思主义发展与毛泽东历史地位的 研究	(129)
第三节	两条路线斗争史的研究	(135)
第四节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宣传	(136)
第五节	一些历史事件和问题的研究	(138)
第六章	我国国际共运史研究的春天	
	(1978 ~ 1989 年)	(143)
第一节	国际共运史重要组织和事件的研究	(144)
第二节	苏俄及其他国家革命和建设的研究	(158)
第三节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和思潮 研究	(167)
第四节	第三世界社会主义的研究	(171)
第五节	对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思考	(178)
第六节	重要人物及其思想的研究	(181)

第七节 对国际共运史若干历史经验的总结	(209)
第七章 国际共运史研究在我国的新发展	
(1990 ~ 1999 年)	(221)
第一节 对苏东剧变的原因和教训的总结	(222)
第二节 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与改革的进一步 研究	(240)
第三节 非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及社会主义运动的 进一步研究	(248)
第四节 关于国际共运史发展的曲折及前景研究	(272)
后 记	(280)

导 言

(一)

在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以下简称国际共运史）研究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了。早在 1899 年，由外国资本家和传教士创办的“广学会”机关报《万国公报》发表的李提摩太等译、蔡尔康笔述的《大同学》就介绍了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从那时起，我国的国际共运史研究经历了由零星的知识介绍到系统深入的研究。这一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订，以及借鉴各国的经验，吸取国际共运曲折与挫折的教训，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世纪之交，回顾百年来的国际共运史研究的成就和不足，不仅有利于这一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而且有利于我们从新的历史高度进行反思，在更高的层面上总结国际共运的经验教训。

把百年来的国际共运史研究作为研究对象，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深入到浩瀚的学术著作、学术论文、学术资料中去全面了解不同时期不同学者的学术思想、学术贡献，并给予客观而恰如其分的评价。我们还应注意国际共运史上各种政治思潮、政治运动和重大政治事件，以及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对国际共运史学术研究的影响。因此，研究的范围极其广泛，既要注意各个时期著作、论文和史料的主要内容和学术观点，又要分析不同学者的史学思想；既要看到对某一事件的不同观点，又要看到外部环境与学术研究之间的相互影响。这是一项相当艰

巨、繁重的工作。

对国际共运史学术研究的回顾或评述，在本书之前就有很多学者进行过尝试，并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作出了开拓性贡献。我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界著名专家高放教授在 1986 年就写了一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史导论》的论文，论述了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兴起算起 140 余年世界范围内对国际共运史研究方法的概况。1990 年，他又发表了《建国以来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史学科的发展》一文，对建国以来我国的国际共运史研究情况进行了回顾。另外，国内的其他学者也对我国的国际共运史研究进行学术评析。例如，1986 年《求索》杂志第一期发表了张胜祖的论文《中国人民对国际共运情况和社会主义学说的最早接触》，介绍了 19 世纪 70 年代到 19 世纪末这段时间中国人对国际共运知识的零星接触。1989 年《世界史研究》第 12 期发表了高敬增的《十年来我国国际共运史研究概述》一文，对 1979—1989 年十年间我国学界对国际共运研究的若干热点问题进行了综述。全国还有不少学术期刊对国际共运史研究进行年度综述。还有的文章对国际共运史研究进行探索，例如，《马克思主义研究》1986 年第 4 期发表的《国际共运史研究的方法论》，《社会科学报》1988 年第 4 期发表的《如何深化国际共运史的研究》等。上述研究成果对推动我国的国际共运史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二)

本书根据学术研究的高潮与低潮和学术研究重点的变化，把 20 世纪我国的国际共运史研究分成七个阶段，在此基础上构架了本书的七章。

第一阶段，1921 年之前，我国国际共运史研究处于启蒙

时期。

中国人早在 19 世纪 70 年代就已零星地接触了国际共运史的情况。例如，王韬游历欧洲归来后译写了大批报道交香港《华字日报》发表，曾提到了巴黎公社。1873～1882 年间江南制造局编译的《西国近事汇编》提到了西欧各国的社会党和第一国际，《万国公报》从 1891 年底以小说的形式介绍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1899 年《万国公报》连载了李提摩太等译、蔡尔康笔述的《大同学》，这是对国际共运最初的有理论性的介绍。^①

进入 20 世纪，我国报刊对国际共运的评介和研究才逐渐多了起来，如朱执信在 1905 年 11 月 26 日出版的《民报》第 2 号上发表的《德意志革命家小传》。宋教仁在 1906 年 6 月的《民报》第 6 号上发表的介绍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万国大会党略史》等。十月革命后，我国介绍国际共运史的著作迅速增加，李大钊从 1917 年起发表介绍国际共运重大历史事件的文稿有 20 多篇，如《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马克思与第一国际》、《1871 年的巴黎“康妙恩”》、《五一·May day 运动史》等，1920 年到 1921 年 3 月，他还在北大讲授《工人的国际运动》。瞿秋白等人在这一时期也写了不少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章。这一时期有很多报刊发表介绍社会主义思想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章，其中有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新民丛报》、《政艺通报》等，也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浙江潮》、《江苏》、《民报》等，还有无政府主义者的刊物《新世纪》、《社会星》、《天义》等，但对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介绍最多的还是五四运动前后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创办的刊物。例如，

^① 张胜祖：《中国人民对国际共运情况和社会主义学说的最早接触》，载《求索》，1986 年第 1 期。

李大钊和陈独秀创办的《每周评论》、李大钊参与编辑的《晨报》副刊、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以及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建设》、广东的《中华新报》等。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些译著，如李季译的克卡朴的《社会主义史》等。

总起来讲，建党之前国际共运史知识在中国的传播零散而不系统。十月革命后在中国形成了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高潮，国际共运史知识也得以迅速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起了推动作用。

第二个阶段，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国国际共运史研究处于早期阶段。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的国际共运史研究与介绍主要是由中国共产党人承担的。这一时期的研究较以前深入，开始具有理论研究色彩，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熟和壮大起了促进作用。《新青年》作为中共中央的理论性机关刊物，从中共成立到1926年7月终刊的九期中发表了列宁和斯大林的不少著作，如列宁的《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社会主义国际的历史地位和责任》。《晨报》副刊从1921年6月到1922年11月发表了中共创始人瞿秋白发自苏俄的大量通讯达16万字之多，使中国人民有机会较为全面地了解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中国青年》是团中央刊物，1923年10月创刊后积极向中国青年介绍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发表了邓中夏的《列宁年谱》、硕夫的《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任弼时的《列宁与十月革命》等文章，中国共产党的旅欧支部的机关刊物《赤光》从1924年2月创刊到1930年3月共出55期，也介绍了国际共运的不少知识，如周恩来的《列宁死后的苏联》、《将开的国际共产党第五次大会》、《德国革命运动的过去》等。此外这一时期刊登国际共运史研究或介绍方面文章的刊物，还

有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中共北京区委主办的《政治生活》、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刊物《中国工人》等，这些刊物还经常出专号，对某些问题作集中介绍或研究，如《新青年》出了《共产国际》专号和《世界革命》专号，《晨报》副刊出了纪念俄国革命五周年的《俄国革命纪念》专号，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出了《李卜克内西纪念特刊》、《纪念列宁逝世周年》专号、《纪念十月革命七周年》特号等。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形势严峻，上述刊物相继停刊或变质。国际共运史的研究和介绍陷于沉寂。1930年上海春潮书店出版了由刘侃译的桑巴特著的《19世纪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除此之外在当时的国统区由于国民党查禁进步书籍，鲜有国际共运方面的书籍出版，更遑论研究了。

在革命战争年代，我党对国际共运史的研究也相对薄弱。延安时期我党开始重视学习国际革命的经验，1936年成立的抗日军政大学曾开设联共（布）党史课程，1938年5月成立了马列学院，开了近代革命史课程，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1939年底即有了中译本，延安整风期间，《教程》的结束语被定为整风的文献之一。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还号召全党学习国际革命的经验，要懂得外国革命史。他认为学习国际革命的经验要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中心材料，认为它“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范，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①。当时，国际共运史研究所涉及的面是比较窄的。

第三阶段，从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到1956年，我国国际共运史的研究处于初步发展时期。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页。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成为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榜样，与此相适应，学习、宣传苏联经验，歌颂中苏友好、歌颂斯大林成为理论工作的重点，报刊涉及国际共运研究的文章多体现了这一主题，如艾思奇的文章《学习苏联，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人民日报》1949年11月7日）、沈钧儒的文章《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从苏联找到了真理》（《人民日报》1949年12月22日）、柯柏年《斯大林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人民日报》1949年12月23日），还有北京时代出版社1950年出版的《中苏友好空前发展的一年》等。联共（布）党史仍是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但较多的成果都是对列宁、斯大林论述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诠释，缺乏创见。

除了学习苏联、歌颂苏联和斯大林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些解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总结国际工运及国际共运史经验的重要著作的读物，如柯柏年的《介绍〈共产党宣言〉》、《介绍〈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英文本导言》等，世界近现代史教材都用相当多的篇幅介绍国际共运、国际工运方面的内容。报刊上也发表过一些专题论文，如1955年《新史学通讯》发表了关勋夏的《19世纪末美国工人运动的特征》、1956年《历史研究》上发表杨立文的《1848年巴黎无产阶级的六月起义》等。这一时期还有些文章联系国内外实际阐述历史经验，例如，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长江日报》在3月18日刊登了龙潜的文章《学习巴黎公社的经验坚决镇压反革命》，中国人民大学《科学集刊》第二集发表高放的文章《从巴黎公社与十月革命的历史吸取镇压反革命的经验教训》。当南斯拉夫同社会主义各国恢复关系时，韩承文在1955年发表了《如何认识南斯拉夫》一文。

总而言之，这一时期国际共运史的研究尚未全面展开。就研究方法而论主要是对经典著作诠释，从研究对象上讲主要是

中苏关系和联共（布）党史。此外，研究作风上，还存在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问题。

第四阶段，从1956年至1966年，我国国际共运史研究有进展但也存在倾向性问题。

1956年苏共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错误，指出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有关个人崇拜、歪曲历史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正面肯定苏共二十大的同时，也与苏共领导人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互关系、如何评价斯大林等问题上发生了分歧。《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及中共中央针对苏共中央“公开信”而写的九篇评论中，就苏联模式、如何评价斯大林、和平共处等问题提出了不同于苏共观点。这一时期报刊还大批南斯拉夫。我国共运史界及理论界关注的问题还有社会主义阵营问题、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及民族解放运动问题等。

这一时期由于国际和国内形势的需要，中央对国际共运研究的重视，国际共运史的专业研究队伍开始形成。在刘少奇同志的关心下国际共运史进了大学课堂，在高校形成了较强的研究队伍，同时中央机关也开始抽调力量从事国际共运史的研究。1953年中联部成立了编译室，主要负责向中央提供有关当代国际共运的资料。1960年中央编译局组建了国际共运史资料室，负责收集和编译有关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史料和有关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史料。

这一时期出版了大量的著作和论文。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马列主义教研室编辑出版了从《科学共产主义的诞生》到《战后国际共运的发展》共13本一套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资料汇编”。三联书店出版了《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两册和贝拉·库恩编的《共产国际文件汇编》三册，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珍妮·德格拉斯编的《共产国际文件》第一、二卷，

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巴黎公社会议记录》和《巴黎公社史料辑》等。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基础系编写了我国最早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材。威廉·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许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的著作也得以出版。研究国际共运的学术论文也较多地在报刊上出现。高放教授认为，到60年代上半期，我国的国际共运史研究已开始了独立研究阶段。^①

但是，这一时期的国际共运史研究受到了“左”倾思想的影响，出现了凭主观臆断来剪裁历史的倾向。从60年代初起，为了配合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央编译局出版了《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丛书，把普列汉诺夫、考茨基、伯恩斯坦等人的著作都包括在内，甚至还选进了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法共总书记多列士的言论。当时还出版了一套马恩列斯论国际共运各有关专题的资料，大多也是断章取义，寻章摘句。这时开始出现强调国际共运中两条路线斗争的文章，还有些不恰当地搬弄国际共运史为“左”倾错误提供依据的文章。如1958年全国刮共产风时，张春桥曾援引巴黎公社关于公职人员薪金的规定反对按劳分配的原则等。这一时期的国际共运史研究有了独立的研究机构的和一支专业研究队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研究中带有越来越强的片面性。

第五阶段，从1966至1978年，我国的国际共运史研究出现倒退，被严重扭曲。

这一时期的国际共运史研究实际上已陷于停顿，国际共运的有关知识被用来为领袖的言论作注释或为极左政策辩护。国际共运史研究中突出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路线斗争，片面突出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把暴力革命说

^① 高放：《建国以来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史学科的发展》，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0年第2期。

成是世界革命惟一道路。受“左”倾思潮的影响，国际共运史研究中甚至出现歪曲历史、剪裁历史和用历史为“左”倾错误服务的非正常现象。

在国际共运史研究中，还形成了一股神化领袖，妖魔化另外一些历史人物的坏风气。即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说成是一贯正确的先知，正确路线的化身，并认为毛泽东是世界革命的领袖，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顶峰，而对历史上犯过错误的人物的功绩一笔勾销。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的一些十分著名的历史人物以及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及东欧国家的一些领导人，不加具体分析地都把他们当成修正主义分子、机会主义分子加以扣帽式的批判。

此外，在国际共运史研究中，大搞路线斗争。出于现实政治斗争和推行“左”倾路线的需要，把国际共运史描绘成一部路线斗争史。当时出版了不少联系“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现实”讲解《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等经典著作的读物。与此相联系大兴“影射史学”“比附史学”。往往把现实中极左文章比拟为历史上的光辉文献，如把康生炮制的某大学的“第一张大字报”说成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的宣言”；上海的造反派夺取政权后自比巴黎公社而成立所谓的“上海公社”；为了比附中共党内路线斗争，对国际共运史的历史人物也排出了十个“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头子。1976年“天安门事件”后发行了一本《纳吉与匈牙利反革命叛乱》的小册子，把“天安门事件”比作二十年前的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四人帮”还借批外修来批内修，策划编写一套“机会主义头子”的传记来影射党和国家领导人和一些老干部。

以上这些现象严重摧残和扭曲了我国的国际共运史研究。

第六阶段，1979至1989年，这是我国国际共运史研究的